

冀朝鼎：经济学博士的“战略潜伏”

近日,我看了一些关于冀朝鼎的资料,评价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杰出领导人,素有“红色中国秘使”之称,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冀朝鼎(后排右)与冀朝铸(后排左)、冀贡泉。

■ 白卫星 本报副主编

我生长在晋商故里——太谷县。在改革开放前,我常听起父亲讲述民国时期金融界的趣闻,如孔祥熙如何信赖冀朝鼎等佚事。解放前的金融界尤以山西人居多,家父于1944年进入国民党政权时期的中央银行察哈尔省分行工作,孔祥熙又是太谷人,了解冀朝鼎与孔祥熙的佚事也就不奇怪了。近日,我看了一些关于冀朝鼎的资料,评价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杰出领导人,素有“红色中国秘使”之称,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对他的人生品格,特别是他充分运用在美国学到的经济理论为党和国家做出的杰出贡献深感钦佩。

一、一门“三冀”,尽忠报国

冀朝鼎生于1903年,山西汾阳人。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与周培源、梅汝璈均系同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4年赴美国留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冀朝鼎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是我党难得的一个“三通”(英文通、美国通、国民党通)干部。

冀朝鼎之父——冀贡泉(1882—1967),1913年任山西政法学校校长,1932年任山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47任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冀贡泉一生著述颇丰,在法学界影响颇大。著有《伦理学》《法学通论》《法律哲

理》《中外条约提要》等。

1939年,周恩来同志交给冀家父子两个任务:一是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壮大;二是促进中美人民友好,并促使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抗日,建立新中国。冀贡泉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携夫人张陶然、长子冀朝鼎、四子冀朝理、五子冀朝铸和女儿冀青离开重庆抵达美国。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他们创办了《华侨日报》,由冀贡泉担任主编。这份报纸成为我党在美宣传抗日的重要阵地,在当地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急于要了解日本的情况,于是聘请曾经留学日本、目前又在反法西斯阵营工作的冀贡泉,到美国战争情报署太平洋司工作,直到1947年。美国战争情报署和战略服务署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在美国,冀贡泉工作任务繁重,生活担子不轻,但他在异国他乡仍注意培养和教育子女心系三晋桑梓,千万不可数典忘祖,要利用机会多多学习知识本领,为日后回国服务。他本身热爱祖国、刚正不阿的高尚品德对子女更是无声的示范。

冀朝鼎之弟——冀朝铸到纽约后,父母送他到八年制学校念书,后又考入哈佛大学。冀朝铸自小受父亲影响,忧国忧民,奋发辟厉,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只要是对国家人民有利的事情,他都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冀朝铸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他毅然放弃了自己在哈佛的学业,于1950年10月回国,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52年4月,冀朝铸赴朝鲜开城参加中国和谈代表团工作。1954年4月到外交部工作,先后参加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亲历了中美建交、尼克松1972年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谈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1991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从冀贡泉到冀朝鼎、冀朝铸,一门“三冀”的爱国情怀,堪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杰出典范”。

二、潜形匿影,纤尘不染

196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这样一条消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冀朝鼎同志逝世。消息说,冀朝鼎治丧委员会已经组成,主任委员是陈毅。三天后,首都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在首都剧场举行公祭,仪式由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担任主祭。这种规格显然超出惯例。

原本只安排的一般追悼会,报告送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周恩来。周恩来批示:第一,在治丧委员会中加入他和邓颖超的名字;第二,他要亲自参加追悼会;第三,追悼会不能在一般地方举行,要改在首都剧场。周恩来作为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战略性”作用。

悼词中的“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出污泥而不染”这句话,是周总理在审稿时亲自加上的。这既是党和人民对冀朝鼎同志的崇高评价,也反映冀朝鼎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战略潜伏”者。

冀朝鼎在中共“一大”前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4年秋,21岁的冀朝鼎在清华毕业后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赴美前夕,冀朝鼎有幸得以拜访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李叮嘱冀朝鼎等人,到美国后要留心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要善于向美国人民学习。他特别强调,在国外留学要时时想着祖国,要结合中国的情况,学习对人民有用的知识。

冀朝鼎在美国一边苦读,一边从事进步活动。1927年春,冀朝鼎作为美国反帝大同盟和中国留学生“中山学会”的代表,前往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等组织召开的第一

次大会。经与会的中共代表介绍,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美共中央中国局的创始人,冀朝鼎参加了最初的领导工作。嗣后,冀朝鼎参加了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结识了周恩来并使他很快成为周恩来的翻译。他后又回到美国继续攻读经济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或许是组织授意,也或是处心积虑,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

1935年,著名银行家、中国近代旅游业创始人陈光甫(1881—1976)担任环球贸易公司董事长。环球公司是国民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1939年,陈光甫要物色得力助手,在美国财政部工作的美共关系人把当时已享有声誉的冀朝鼎介绍给陈光甫。在纽约一家餐馆里,陈光甫为冀的谈吐、流利的英语所打动,遂招为自己最信赖的助手。宋子文、孔祥熙访美期间,陈光甫把冀朝鼎介绍给宋孔二人。鉴于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冀贡泉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自然而然博得了孔祥熙的厚爱。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贸易中断。陈光甫与冀朝鼎回国。借此机会,冀朝鼎被中共秘密派到国民政府从事经济工作,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精彩的“潜伏”生涯。

冀朝鼎借助已担任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的爱德华的帮助和孔祥熙的赏识,他经常出入孔府,成为宋霭龄的座上宾。

此时,蒋介石正迫切需要一位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专家,以随时顾问左右。于是,经过孔氏夫妇推荐,冀朝鼎得以谒见蒋介石,被任命为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的“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方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冀朝鼎成为国民党政府决策层的主要经济智囊。

1944年,孔祥熙担任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并能借箸代筹的经济学家。

1946年,内战爆发。周恩来在撤回延安前通过邓颖超给冀朝鼎留了一封书信。信上说:“本拟留书给你,以临行匆忙未果。特代草数行以寄意。兹时局势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作更多贡献。”正是因为与周恩来单线联系,并受其指示的冀朝鼎趁机向宋子文、孔祥熙建议,以金圆券替代法币,整顿金融政策,使货币重归统一。宋孔大喜,自以为良策,决心采纳这位著名经济学博士的建议。事发不到一年,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当然其原因主要是军事战略失败,但金融市场的破坏加速了这种灭亡,则是不争的事实。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的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1948年,冀朝鼎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他此行也是专门受周恩来派遣,意在与其父冀贡泉一起策反傅作义。因为冀贡泉和傅作义私人关系很好,傅就是冀贡泉的住处同中共秘密谈判决定起义的。

这一年,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为了亲自了解和搜集有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信息和资料,继续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在我国香港曾经与冀朝鼎等人进行接触和交往。

北平刚解放,他还没来得及换装,穿着国民党呢子军装,坐着美军吉普车出门,结果被解放军抓住,以为他是漏网的国军高官。情况汇报到负责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那里,他立刻让放人。从此,冀朝鼎的共产党身份才正式曝光。“这让国民党大吃一惊,美国人大吃一惊,我们自己的同志也大吃一惊。”

在国民党内,冀朝鼎是孔祥熙的亲信,在政经学术界都有不少熟人和朋友,如宋子文、翁文灏、胡适、蒋廷黻、陈光甫、贝祖貽、席德懋等都有交往,同许多达官贵人,过从甚密。他是我党在国民党内部钻得很深、接触很广的人。可以说,冀朝鼎先后利用担任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合法身份,费尽心机为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经济战略情报。

冀朝鼎的“战略潜伏”意义和作用正在于此。难怪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回忆录——《成败之鉴》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冀朝鼎“潜伏”的精彩之处就是他“出污泥而不染”,忠不避危,全身而退。

三、沉谋研虑,智尽能索

新中国成立后,冀朝鼎的最重要工作,就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突破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并建立了新中国的外贸体制。

1949年,冀朝鼎奉命南下上海接收中国银行,任中行副总经理。中国银行迁到北京后,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随后又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兼外贸管理局局长。1950年我国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参加联合国代表团的班子:张闻天为团长,李一氓为副团长,冀朝鼎是该团主要成员之一。当时已正式任命冀朝鼎为我驻联合国社会与经济理事会首席代表。

1951年秋,他应邀赴英国到剑桥大学讲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应邀去外国讲学的中国学者。中国贸促会成立后,由南汉宸任主席,冀朝鼎任秘书长,1955年冀晋升为副主席。(1954年,吴敬琏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曾经为作冀朝鼎、姜君辰等助手。)在冀朝鼎主持下,中国贸促会从民间的渠道,通过各种经贸活动,积极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这样,封锁禁运的壁垒被一个一个地突破,贸易伙伴越来越多,影响不断扩大。不久,冀朝鼎就积极主持筹备建立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和海事仲裁委员会,对促进我国对外经贸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冀朝鼎也是创建和发展贸促会以及我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先行者之一。1959年,中国和奥地利尚未建交,但五星红旗却在维也纳国际博览会的上空迎风飘扬,中国馆展出的产品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但个别反华分子伺机指责我们展出的产品是仿造的。冀朝鼎认为,这件事值得我们反思。因为我们的展品毕竟有“侵权”的嫌疑。回国后,他立即决定在贸促会法律部建立商标注册业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这项业务不断提高扩大,以至现在发展成为包括商标、专利、版权,颇具规模的一整套知识产权业务。它为我国扩大对外经贸关系、引进先进技术发挥积极作用。

1963年,周恩来指示,当前除继续发展工农业生产外,还需大力开展对外工作。而贸促会这个便于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的单位,就应进一步发挥其积极作用。因此决定贸促会扩大编制,加强领导,由国务院外办公室直接主管贸促会的工作。这时候,阿尔及利亚已摆脱了法国殖民统治。因此周总理指示冀朝鼎,要他利用去阿尔及利亚主持中国展览会的机会,和本贝拉接触,了解阿的政治走向,以便获得第一手材料,供中央制定中阿关系的政策作参考。1962年12月,冀率领代表团赴斯里兰卡参加亚洲经济讨论会时,行前周总理

突然把他叫去,就有关中印边境战争问题,给冀面授机宜,派他作为秘密特使,向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转达周总理的口信:请班夫人向印度总理尼赫鲁转达我方立场,表明愿意停战、撤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领土纠纷。冀朝鼎抵达达科伦坡后,就由大使陪同紧急约见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夫人立即将这一信息传递给尼赫鲁。两天后我国便发表了停战撤军的声明。……在许多外交活动中,冀朝鼎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

冀朝鼎很爱才。他担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时,看到王雷鸣(1916年生人,著名经济史学家)的才华,很器重王雷鸣,并买了一套《二十四史》送给王雷鸣。王雷鸣从此专注于清代经济史的研究,并完成《清代经济史》。

1963年夏,冀朝鼎的糖尿病、高血压已很厉害。但他去医院住了没多久,就回来工作。由于他劳累过度,积劳成疾,致使脑溢血突发,倒在办公室,遗憾地与世长辞。

生命的价值不在长短,而在于精彩。冀朝鼎传奇的六十载人生不正是生命价值的最好论注吗?

四、鞭辟近里,威望素著

冀朝鼎的代表作品主要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经济区域》等。

其中,《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经济区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区域经济史著作,2010年4月被收录于商务印书馆的大型出版项目——《中国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他用英文写作并发表于1936年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该书中文译本于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开创了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先河。冀朝鼎以翔实的史实论证了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特点和差异以及它们形成的原因,由此总结出导致各经济区域中心地位转移的“铁的法则”,即政治权力和区域经济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国随经济区域的变动而出现分裂与混乱,直到新的经济区域的崛起,国家才又恢复统一。这部富有独到见解的著作出版后很快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高度评价说:“这一著作也许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方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

冀朝鼎的这部著作同样应视作上世纪30年代我国社会史论战的一部分。它雄辩地向世界表明,中国绝不是一个停滞的社会,恰恰相反,中国社会内部充满着矛盾运动,而且按着自己特定的运动规律发展着。该书最富有启发性的有两点:一是认为对当代的中国根本性问题必须进行历史性的探索才能对其有更深刻的认识;二是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应当去发现那些左右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美国著名学者史坚雅有关中国宏观区域系统的研究就能看到冀朝鼎的影响。

数十年来,《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在英美经济界深孚盛名,一直被西方学者当作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读物。冀朝鼎在1930年代研究的课题在1970年代的美国仍为人所关注,美国学者珀金斯在其《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一书中,称冀朝鼎的研究是种“拓荒工作”,“如实反映了当时水利建设水平的真正趋势”。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懋堪该书看成是用“现代”风格写成的最早的中国环境史的重要著作。

1957年,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冀朝鼎大胆地向中央提出了几条建议:利用外国资金;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建立经济信息中心。这几条建议,现在看来并不突出,但在当时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这样的观点确是十分超前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是当时最具世界眼光的人之一。

现代大国根基:财税改革与预算管理

■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上接02版)

从目前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审计制度模式来看,世界各国现在有立法型、司法型、独立型和行政型等四种审计模式。从中国改革开放后审计制度的演变史来看,在1981年,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关于建立审计机构的指示,财政部研究后曾提出了建立审计委员会的三种设想方案:一是在全国人大常委领导下设立国家审计院或审计委员会,二是在国务院领导下设立国家审计部或审计总局,三是在财政部领导下设立审计总局。当时经过反复考虑,在1982年中国修改宪法时,最终确定了实行现行的“行政型审计模式”,即在国务院下设立一个国家审计署,

并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县设立作为国家审计署派出机构的审计厅和审计局,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根据目前中国财政体制出现的种种问题和近些年政府官员腐败渎职的现象大面积发生而屡治不果的现行国情,我们建议改革我们国家的审计制度,重新考虑从现在的“行政型审计模式”向“立法型、独立型或二者混合型审计模式”过渡。可考虑像英国的国家审计署(National Audit Office,简称NAO)、美国的问责总署(General Account-

ability Office,简称GAO,或译“问责总署”)或日本的国家“会计督察院”那样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督察院”(同时也可考虑在财政部内部也保留或设置一个“审计局”或“审计司”),而审计督察院长则由国家主席提名,人大和政协大会投票通过而较长时间任职。加强对各级政府预算决算的审计、督察和问责,独立的审计督察院和在人大立法机关中设置一个独立的和功能化的监审重要的常设委员会,目前看来应该是一项重要的和切实可行的改革。在国家的基本制度上进行这样的改革,可以认为是能够建立起长久的反腐、惩腐的制度机制,是保证我们国家长期繁荣、稳定、和谐的国家制度安排方面基本建设。

第三,在人大内部构造一些预算管理机构的,同时,进行政府内部财政预算决算的改革,可考虑像政府的OMB模式一样,强化财政部在政府各部门间“全口径”预算的编制和统筹权力,使财政部及其预算司有汇总编制各部门预算的权力,对全部政府性收入实行统一、完整、全面、规范的预决算管理,尽量消除各级和各地政府部门及其所属机构的“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把政府性全部预算收入分类编入公共预算、政府性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保基金预算,建立

起政府“全口径预算收支体系”。

第四,财政部要与央行一起,健全和完善央行国库的“单一国库账户”制度。这牵涉到3个方面的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1)强化而不是削弱财政部的对政府部门的财政资金收支的统筹权力。政府预算一旦通过,即为“法定”,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财政法定”和“预算法定”的意思。一旦达到“预算法定”,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领导不得干预财政部门按照年初预算进行财政收支的财权,即使有国家的较大经济波动和重大自然灾害和国家突发事件等情况需要进行政府预算调整,也要经人大及其相关职能机构讨论通过后才能修改。党政领导除了在自己职权内所特设的一些专用基金外,不得随便和任意干预各级财政部门的独立财权,且应该杜绝主要党政领导上的“靠拍脑袋”而任意动用政府预算资金的做法。另外,行相应地财政体制改革,使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相匹配。(2)政府的全部财政资金应当及时缴存入设于央行的国库单一账户,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占用、挪用或者拖欠。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者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特定专项资金,可以设立财政专户,但现有财政存款账户(国库单一账户和财政专户)的资金流入、流出及余额情况应当每月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

告。(3)国家实行国库集中收缴和集中支付制度,对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全部收入和支出实行国库集中收付管理。税收和财政资金缴存“直达”国库单一账户;资金拨付从国库单一账户“直达”政府采购的供应商账户。

如果做到上述3点,不但可以建立起了中国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上有了根本性进步,而且有望从根本制度上堵住许多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漏洞,建立起完备的和切实有效的防腐、反腐和惩腐的制度保障机制。

概言之,在国家的基本制度构架的改革和建设上,要做到政府预算制度的“民主化”和“现代化”,从而逐步实现从“税收法定”、“财政法定”到“预算法定”。这样,一方面要加强财政部对政府所有财政收支编制全面预算的统筹和支配权力,另一方面在人大内部建制上建立起真正实体化和常态化的预算委员和常设机构,来全程参与国务院和财政部的预算编制、执行、实施和审查监督。在国家的审计和督察制度方面,升级国家审计署,在人大内部或在国家的最高权力层面上设置一个独立的“国家审计督察院”,并相应健全和完善央行经理国库的“单一国库账户”体制,基本做到把政府所有财政资金入出央行的“单一国库账户”。

这样一来,在政府的财政预算编制、执行、实施和决算的整个过程中,前面在制定预算时有人大预算委员会的参与制定和审查,中间有预算工委或拨款委员会的审查、批准、监督和制衡,且有央行国库所提供的预算收支和库底资金使用情况的精准数字,事后又有独立的国家审查机关来审计财政部们和各政府其他部门的财政收支情况、支出用途和效率以及是否使用的得当、是否符合年初预算,这样就可以从各个环节上随时堵住现在政府官员腐败渎职的主要渠道,以从制度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国家反腐保廉的制度机制。

上述这些改革措施,不但看来是必须的,而且在目前中国的现行体制下,至少是可行的和可操作的。这既符合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下一步改革设想,实际上也能不断提高中国共党的执政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这实际上是一场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基本建设和创新,是中国走向一个现代国家、建立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社会当为的改革。当然这样的改革,会牵涉到中国现行政府体制的方方面面,将是一套综合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改革,才是中国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

(完)